

家乡来了亲人

谢冕

写的。去国的情思,母爱、亲情,以及青岛海滨往事的追忆,还有她的优美、纯净的文笔,她无疑是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的老师。至于《春水》《繁星》,更是我早年学诗的范本。我曾说过,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“冰心教我爱,巴金教我反抗”。她甚至是我人生和智慧的最早的开蒙人。我如今的抒情笔墨,是冰心给我的,我的文学情怀——爱心、亲情、人性和自由,也是受到冰心的启示的。

在北大,冰心曾是我的“邻居”。我留校任教后,最先的宿舍是十六斋,而冰心当年在燕京大学任教住的是燕南园。从十六斋到燕南园她和吴文藻先生的小楼,只有一墙之隔,步行用不了十几分钟。燕南园十几座小楼,是司徒雷登校长特为教授们建造的,一家一座楼,很是豪华。园中小径婉转,花木葱茏,静谧而优雅。在北大,燕南园是我最爱的地方,因为里边住着冰心先生和一些为我所敬重和景仰的前辈学者,这里也留下了我许多甜蜜的记忆。

冰心入住燕南园的时候还非常年轻,新婚,后来是推着婴儿车漫步湖滨。她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,司徒雷登校长是主婚人。司徒校长为人儒雅,充满爱心。据人们回忆,燕大的职工和教授家中有了喜事,婚礼,或是生日派对,他都会亲自出席致贺。司徒校长爱中国,他早年跟随父母来到中国,传教、办学,后来当驻华大使,他把全部的爱心和精力,甚至生命最重要的阶段、自己的青春都全部献给了中国。为办燕京大学,他赤手空拳,从选址、设计、四处募捐,到最后的施工,点点滴滴,都留着他的心血和爱心。离开中国之后,他晚景凄凉,身无长物。就连一个简单的遗愿,却不能如愿。

话题回到冰心。每次我回福建,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是拜望冰心文学馆。每次都是王炳根馆长亲自陪同。王炳根为我的这位宗亲做了许多工作。他甚至把我和韩晓征拜访过的先生的书房整座都搬到了长乐——连先生日常买菜账单都不遗漏!我感谢王炳根,为他的敬业之心而感动。前些时我回到长乐,乡亲领我拜望了先生的长乐祖居,那里正在整理修缮。乡亲曾嘱我为旧居题字,我不敢。

记得那年,家乡来了亲人。有郭风,有何为,有舒婷和袁和平,还有谁,记不得了。他们应该是代表福建文学界来北京参加文代会吧,亲人们来自家乡,他们要拜访同是福建人的冰心先生。我和冰心是福州人,祖籍都是长乐,又同样都在高校,我在北大,她在中央民族学院。这样,我当然就充当了向导。记得是我委托韩晓征跟冰心先生联系的。我们到达的时候,先生已在书房等待我们。记得迎接我们的有吴青和她的先生,还有墙壁上梁启超先生书写的对联:世事沧桑心事定,胸中海岳梦中飞。题款是: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,梁启超乙丑浴佛日。

落座之后是彼此问候。家人递上香茗,记得是来自家乡的茉莉花茶。来客们都说些什么记不清了。也许也是这一次,我和先生有过较多的交谈。先生知我祖籍是长乐谢家,她问我什么堂号?我记得少时家有灯笼上书“宝树堂谢”,便答:是宝树堂。先生听了,说:我家也是宝树堂。接着便脱口而出:“非谢家之宝树,接孟氏之芳邻”。临别的时候,先生持她与爱猫合影的照片赠我。照片不小,是当时流行的快印店家二寸彩照,猫咪偎依在她身边。

先生持照片停留片刻,翻转过来,她要我留言。但见她举笔先写“谢冕”二字,接着写了“同”字。“同”字之后会是什么字?是当时流行的称呼“同志”?还是校园通用的“同学”、还是“同乡”?我有点紧张,我屏住气息。但见她轻轻一挥,竟是“同宗”二字!她记得“宝树堂”,记得我们同是祖居长乐人,她由此认定我们是一个祖先,同一个宗族,甚至是一个家族!九十多岁的老人,她的思维如此敏捷、如此清晰,用字如此精到准确,不能不为之惊叹!这张照片,因为保留了先生的笔迹,甚至是保留了她活泼的思维,我十分珍惜。如同我所有的“珍藏”一样,如今“隐居”于何处,的确确是找不到了!但我坚信它一定隐藏在某一个安全的角落,肯定会在某一天清晨或夜晚重现在我的身边。

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,我和冰心先生最亲近。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,又兼如今的“同祖同宗”,而是因为我最先接触的新文学作家是她,最先能够读懂并接受影响的也是她的作品。我觉得她的作品和我最亲近,甚至觉得她的《寄小读者》是为我们这些当年的小读者而

笔会

难忘的书与人

朱正琳去世三年零七个月了,遗忘的潮水正在将他淹没。网上无文,文坛不言,这个人似乎就这样消失了。此种情况,不难理解。古今中外,一些多么了不起的人物,不是也都“俱往矣”了吗?生与死、纪念和遗忘本来就是人世常事。这一点,朱正琳自己很达观,甚至有些浪漫。他写过一篇《死的理想》,其中写道:“关于死,我的确有一个理想,那就是:死在海拔很高终年积雪的大山上,譬如喜马拉雅,譬如阿尔卑斯。”“我不是登山者,我的理想也并不是想死于登山。我只是在想:那雪山好大、好高、好空阔、好干净,而且离家好近!那天也太蓝了!……为什么不死在那儿?”但他又说:“当然,这只是理想。与我生活中的许多理想一样,我不认为我今生有实现它的可能。我不是佛教徒,不会在我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跑到山顶上去死。若等到我弥留之际,我无法想象我怎样才能到达那个海拔高度。更要紧的是,死虽然是孤独的事,但我们却很难孤独地死去。”

朱正琳是浪漫的,又是理智的。他因病以七十二岁之龄故于美国,走的时候,家人在他身边。

如今,我对正琳兄突然离去的哀伤和三年多的牵绕似乎平复了一些。而且,他毕竟留下了一些痕迹,比如几本朴素的书,还有他倾心倾力主编的刊物……包括《成长》。

《成长》是一次通宵夜聊聊出来的。那是1999年深秋,在慕田峪长城附近一家部队招待所里。成立六年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召开下一年的选题研讨会,嘉宾有三联书店的杨进、人民日报的李辉和央视“读书时间”栏目的朱正琳。那几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了不少有分量的书,如《风雨中的雕像》《汉字王国》《大陆与情感》《天山问穹庐》

笔会

等,“读书时间”连着做了好几期专访,在全国出版社里可谓独占鳌头。朱正琳说,没办法,你们的书就是对着我们栏目来的。

以我所见,很多做出版的,都有一个情结,就是希望做那种水平很高,又明白易读的书。这里面当然含有争取更多读者,获得经济利益的因素,但主要点并不在此——好书能分享给更多的人,使更多人受益,才是出版人最大的满足。所以,我为出版社提出的出书方向就是“高品位的通俗读物”,比如《老照片》。说起来与朱正琳的初识,还是他在央视策划《老照片》的专访,以及参加在《中国摄影报》上对《老照片》的讨论所提供的机缘。

如上所述,我也有个偏好:为中学生出书,而且认为,真正的好书,是中学生和成年人、普通大众和文人学者都可以读的;我本人也喜欢读《幼学琼林》《国文百八课》之类的书。也许是我青少年时未能得到系统教育,直接上了大学的缘故?朱正琳也是这样。白天选题会开得热烈,晚饭后我到他的房间聊天,聊起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经历。我们都“偷”过书,我是从家附近的市图书馆装满要拉去化浆的“坏书”的卡车上,以及疗养院对图书管理不严的图书室;他的花样更多些……但无论如何,谈到当年读的那些书,以及那些书对我们刻骨铭心的影响,仍感怀不已。1980年,他三十三岁,以第一名的成绩,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张世英教授的研究室,专研德国哲学。此事曾经历挫折,并因《中国青年报》的报道引起轰动……毕业后教书,去德国访学,然后“北漂”……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出版。他说,在“读书时间”栏目打工,过眼的新书好书很多,常有相见恨晚的感觉,甚至认为,有些书若在青少年时代能读到,极有可能改变自己

笔会

的一生。所以,有时不免会产生一种冲动,想把其中的一些文字推荐给青少年。在功利考虑还没有占据压倒优势之前的青少年时期,人对内在生活的需求会很强烈。他想编一本文摘刊物,可以让时下非常忙的孩子吃到最有营养的精神食物。

后来我知道,朱正琳对编刊是有瘾的。此前他已编过两个刊物,还参加过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早期的筹划。这也巧了,我对编刊也一直有兴趣,而且算得上是编刊出身的(编了九年《山东画报》)。做出版后,也策划出版过几个刊物:《老照片》《老漫画》《百象图说》《唯美》(与张炜合编),对办刊的方法和运作比较熟悉,所以谈到这个议题,我们一拍即合。朱正琳愿意做主编,更令我大喜过望。于是讨论刊名、栏目、稿件来源、出版样式等,一直谈到下半夜三点。让朱正琳胸有成竹的是,有一大帮文化界的好朋友,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水平,有影响,并且和他一样常有向青年人推荐某些文字的冲动的文人、学者。他打算请这些朋友署名推荐他们读到的、喜爱的文章,同时写几句推荐语(不写也可)。这个设想很有操作性。《成长》就在这天夜里育种了。

筹划期间,我俩见过几面,多是在北京美术馆东街三联书店附近的“小贵州”饭馆(后来是“君琴花”),要一盘糟辣椒炒鸡蛋、一盘腊肉炒青蒜和一锅酸汤鱼。他这个生长在贵州的人似乎不怎么吃辣,也没酒量。但那真是难忘的见面,因为每次见面都谈敞开,他那机敏独立的思想、剑走偏锋的论点(朋友语)以及嘴角微漾调皮的笑意,总能感染我。当然也少不了谈稿件进度(我是这本刊物的“责任编辑”)。朱正琳的效率很高,几个月后,书稿成型;2000年7月,第一辑出版了。

打开书的第一页,不是卷首语,也不是编者的话,而是“编者手抄”,是一些哲人的文章选段,很适合中学生摘抄格言名句的爱好(有时候一句格言就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)。翻过来目录页,首先是主编和“特约荐稿人”的名单(刘兵、何光沪、周国平等)。主要栏目只有两个:“世界篇”和“人生篇”。朱正琳认为,探索世界和追问人生无疑是贯穿人类智力生活的两大主题,尤其在智力生活最活跃的年龄:十五到二十五岁。“世界篇”开篇是物理学家费曼的《科学的价值》,紧接着是霍金和杨振宁的文章,都是谈未来的科学的;“人生篇”第一组文章谈读书,作者是梭罗、博尔赫斯、伍尔夫、杨绛和王小波;第二组文章是罗素的《我为何而生》和科菲·安南的《燃亮蜡烛,而不只是诅咒黑暗》……有心的是,文章后面还会有“相关资料”,如《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汽车诞生史》的相关资料是《汽车的发明》和《汽车技术的源与流》;文章之外还有“私人笔记”

笔会

小栏目,活跃在主栏目之间;最后是“编者手记”。整本专辑开放而又严整,有思想,有分量而又不乏趣味,可谓大手笔!与正文相比,我在封二、封三选用的西方文学作品插图倒显得不协调,封面也不够理想。这些,在后面的几辑中做了调整。

第一辑上市后深得好评,但也有人担心所篇文章对中学生过于艰深。对此,朱正琳激烈辩解道:“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才是艰深的!青年人的阅读常常是出于饥渴,那饥渴自会提供消化‘坚硬食物’的酶,何况智力生活本身充满了乐趣!”他还说,“《成长》是办给智力生活特别活跃的青年人的精神‘快餐’,他们需要翘翘脚才能够到”,“我希望‘顾客’从中得到的不仅仅是饱足感,而是也产生出一种更强烈的‘饥饿感’——一种想去‘吃大餐、赴盛宴’的冲动。”

这样,《成长》在悠悠岁月中迅速成长,基本上每季度一辑,很快就拥有了一批执着的“粉丝”,收到许多读者来信。其中一位正在准备高考的学生的长信,我看后很感动,转给朱正琳,大为激动,有第五辑的《编者手记》为证——他引用来信者的话:“我认为好的书是那些我们愿意去啃的书。我不是在提倡不愉快地读书,我的意思是愉快地啃书,愉快地消化费解的话,愉快地与否当然取决于书而非主观的强制……读书的乐趣似乎只有在那种时候才强烈到了我可以触摸的地步。”他评价:“(这位高中生的)信写得文采飞扬,思绪繁多,不像有什么明确的意图。我揣摩他想告诉我的主要意思是,《成长》值得办下去,这对于我来说当然是莫大的鼓舞。”可惜来信者没留姓名地址,从此没了讯息。

后几辑的特约荐稿人有葛兆光、郑也夫、吴国盛、张辛欣、何怀宏、张冠生、黄集伟等,总计前后有二三十人。

2001年8月暑假期间,年届一岁的《成长》编辑部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(今三联韬奋书店)举办特约荐稿人系列讲座,共四讲。讲课人非常热心和投入,听众也很踊跃。我还记得刘索拉讲课,随意请几个听众作打呼噜声,另请几个听众跺脚,几个拍掌,几个无病呻吟(大致如此),然后听她指挥开始发声,此起彼伏,时有和声,于是一阙乐章就出现了——她要讲解的是:任何庸常声音,有节奏地组织起来,就是音乐……

讲座通过媒体的报道,对《成长》的推广起了很大作用,新一年每辑的预定数接近一万本。遗憾的是,不久后我调离山东,后续无人,《成长》做到第八辑(2002年3月),正在兴头上,戛然而止,总寿命不过一年零八个月。朱正琳和我都有些不甘。我到三联书店任职后,建议《读书》出版下半月的文摘版,请朱正琳做主编,或者还可名为《成长》,惜未果。这几年看到朱正琳自己写的简历和生平记事,都把主编《成长》作为重要事项,还专门写过一篇《关于〈成长〉、关于〈成长〉的回忆文章,可见这个天折的孩子在他心中的分量。想到此,不免心痛和歉疚!

如今离《成长》停办已二十余年,创办它的人也去了。我又想起了那句话:“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,但我已飞过”。对人,对书,是否都是这样?

笔会

2023年5月20日晚
北京 十里堡

日本人极爱泡澡。以前,叫“钱汤”的公共澡堂遍布大街小巷,家中没有浴室的年月,去钱汤泡澡就像吃饭睡觉一样,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男女澡堂仅一墙相隔,顶端相通,守店大妈坐在进门处的高台上,左右收银,自由俯瞰两边厢浴场,明察秋毫。客人先坐小板凳上把身体冲洗干净,再下到汤池里慢慢泡,有一搭没一搭和旁边的人聊上两句。钱汤的墙壁上,大都画着或者用彩色小石头拼出富士山的雄姿,身体浸在热气腾腾的水里,思绪却飞到3776米的富士之巅。

钱汤被写进了歌里。斜挎吉他,歌手南こうせつ(本名南高节)款款弹唱道:

你大概已经忘了吧,
红色的手巾围在脖子上,两人一起去过的
那家小巷里的钱汤?
说好了一起出来,结果你总是让我等啊等。

刚洗过的头发凉透了,小小的肥皂嘎达作响。

你抱住我问:冻坏了吧?
年轻时啊什么都不畏惧,
唯独你的柔情让我害怕……

肥皂怎么会嘎达作响呢?有人解释说因为冷。拿洗澡盆的手冷得发抖,引得放在里面的肥皂嘎达作响。青春的一幕以钱汤为背景,粗糙、不富足然而甜蜜美好。这首叫做《神田川》的歌曲作于1973年,发表后风靡一时,后来被刻在碑上,竖立在东京神田川边上一

个公园里。

昭和式的钱汤和歌中的爱情一样消逝了。现在的钱汤宽大明亮,四季如春,在里面呆再久也不会被冻着。几乎家家都有浴室了,去钱汤是换换口味,那里泡澡之外还能吃喝玩乐买,节假日甚至人满为患。泡澡的水也讲究,天天换着放药材放香料,周末还有殷勤的特别版。也不再是大妈独当自关了,男女浴室泾渭分明,时不时调个儿,客人能享受到两边不同的景色和汤池。

如果说泡钱汤是小换口味,那么泡温泉就是吃大餐甚至是盛宴。日本地震频繁,引发温泉处处,人们巧思利用,长年下来,泡温泉成了民众的一大享受。受欢迎的消遣方式若要排榜的话,泡温泉绝对稳居前三名。一家人团圆,泡温泉;年轻人谈恋爱,泡温泉;朋友相聚,泡温泉;公司团建,还是泡温泉。城中许多商务酒店,每天专门从源头拉来温泉水,灌进大浴场让客人享用,“天然温泉”是金字招牌。

夏 岚

甚至婚外恋情中,泡温泉也是节目之一。恋爱小说大家渡边淳一在《化妆》《乐园》中都写有这样的情节,读时就奇怪,作家和当事人不怕被发现吗?

很多年前偶遇日本海岸边的城崎温泉,识得温泉的美妙。温泉镇主街长也就一公里左右,有小河穿过,石桥连起杨柳依依的两岸。七座不同泉质的公共温泉馆,据称具有疗外伤、治关节炎、美颜、保顺产各种功效。数不清的旅馆、礼品店、游戏店、居酒屋一字排开,浴客穿着住宿旅馆配备的和式浴衣,趺拉着木屐,桥这边街那边地闲逛,脚下却像踩了棉花。摇摇晃晃再去安静的温泉寺拜上一拜,睡意已浓得化不开。清晨,早起泡澡人的木屐声渐近又渐远,唤醒无梦的夜,就算算何时再来,

好几个温泉馆没来得及去呢。

从此停不下来。去海边的温泉,日看波光粼粼,夜数渔火点点,温柔的浪打来,分不清脸上是海水还是温泉水;去古木参天的山中,汤雾袅袅,莫惊吓到悠然走过的鹿群,悄悄关掉哗哗的水龙头;乘船登上与世隔绝的温泉岛,在那个叫“忘归洞”的露天汤池里看日落又日出……温泉带人走进别样的世界,那里与市井烟火隔得很远。

然后在温泉旅馆住上一晚。日本的温泉旅馆一般包早晚两顿饭,费用按人头计算。也可以不吃旅馆的饭,只住宿,那叫“素泊”,但如非万不得已,请千万不要素泊!因为那样你会错过出浴后的第二个高潮:一顿丰盛无比的晚餐。任何饕餮,没有任何理由不看重这顿晚餐。有海味,龙虾鲍鱼螃蟹;有山珍,野猪山鸡松茸;还有神户牛松阪牛,米泽牛近江牛,哪个都让你满口溢香,欲罢不能。旅馆按季节变换菜品,盛在精美的杯盘碗盏里,错落有致地摆满一桌,再装点上一朵落樱,或一叶红枫,画一样的美。当你泡得浑身酥软回到房间,拉开房门的那一刻瞬间,再冷静的人都会叫出声来:噢,天!

稍微遗憾的是,近年各地人手不足,能让客人在自己房间进餐的旅馆越来越少,更多的是集中在餐厅吃或者索性开自助餐了。尽管如此,出浴后的那顿晚餐仍是非常值得期待。

文人墨客中不乏温泉爱好者,流连其中留下种种逸话。成书于7世纪后半

到8世纪后半的《万叶集》中,即有和歌咏及日本三大古泉:道后温泉、有马温泉和白浜温泉;文豪夏目漱石连载于《朝日新闻》的绝笔小说《明暗》作于汤河原温泉;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名文《在城崎》写到城崎温泉;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汤岛温泉写下《伊豆的舞女》;《人间失格》作者、战后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太宰治是汤花温泉的常客;《银河铁道之夜》作者、诗人兼童话作家宫泽贤治则是大泽温泉的座上客。今日里绚烂豪华的宝家戏剧,最早本是少女歌唱小节目,专门表演给泡宝家温泉的客人们看的。位于和仓温泉的旅馆“加贺屋”,据说是宫崎骏电影《千与千寻》中汤婆婆的旅馆的原型……有“作家与温泉”一类书,有意又有时间的话,按图去索索摸,不失为雅事一桩。

说到温泉,很容易想到那个奇特的习俗:男女混浴。日本混浴的历史非常久远,编纂于1300多年前的《出云国风土记》中,就有玉造温泉男女老幼混浴的记载。江户时代晚期,这一习俗被幕府下令禁止,但民间禁而不停,把远道而来的美国黑船上的马休·佩里们吓得不轻。进入明治年间,立志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明文禁止12岁以上男女混浴,并整顿各地澡堂。从此混浴一直不被待见,到今天,地方条例频出,条条剑指混浴,最严格的地方规定6岁以上就不得混浴,所以在一般公共浴场,混浴原则上是被禁止了。然而妙就妙在“原则上”三个字,不影响公共卫生和

社会风纪的“其他类公共浴场”被算作例外,于是尤其在九州和东北地区,至今还存留着不少能泡混浴的温泉。

惦记这一风俗的外国人不少,到了日本跃跃欲试。九州别府的那某泉名气最大,外国人去的也多。听去过的朋友讲,里面数大妈们最勇敢,雄赳赳气昂昂走进混浴汤池,如入无人之境。但许多淑女还是在下水前一刻打了退堂鼓,到底没有勇气走进别人想看的风景。事实上日本现在绝大多数混浴,都是穿上衣服泡了,那些被叫做“鳄鱼”的别有用心的家伙们,猫在池里专等着偷看女浴客,实在防不胜防。

泡澡是日常,泡温泉是日常的高级化、仪式化,是对生活的一种褒奖。认识的一位教授退休后在温泉乡买了房子,自家浴室就能放出温泉水来,这一点令他满意得不行。诺贝尔奖获奖消息传来,得主小柴昌俊被守候多时的记者围着一通采访,临了被问到:现在最想做什么啊?他脱口说:和太太去泡个温泉。这回答,讲给中国朋友听,大笑道:诺贝尔奖啊,就这?但日本人大都呵呵一笑,瞬间共情。

温泉不计其数的日本,年年有名目繁多的评比、排名,山里或海边的最佳,东日本或西日本的第一名,百年老汤对决现代浴场等等,哪一款都引人心动。春花开,秋风起,夏避暑,冬趋暖,每个季节都是出发去泡温泉的好时候。

2023/5/17 于大阪